

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CSSCI)
来源集刊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28

汪丁丁 主编

陆铭 钟辉勇

大国发展：地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何圆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能成为中国式养老的福音吗？

鲁建坤 吴湘华

网络能帮助反腐败吗？

阿西莫格鲁 罗宾逊

贾拥民 编译

资本主义一般规律之兴衰

文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28

汪丁丁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 28 卷 / 汪丁丁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689-3

I. ①新… II. ①汪… III. ①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6835 号

责任编辑 袁晓琳
装帧设计 荀冠虹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 28 卷 汪丁丁 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168,000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689-3/F·2276
定 价 50.00 元

文
景

Horizon

主 编：汪丁丁

编 委（排名不分先后）：

陆 铭 周 濂 张 静 丁 利 冯克利
曹正汉 景跃进 史晋川 叶 航 黄先海

执行编辑：贾拥民

主 办：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特稿

- 1 大国发展：地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陆 铭 钟辉勇

论文

- 20 宗教人及其制度含义 盛 洪
- 34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能成为中国式养老的福音吗？
——基于养老视角的生育决策 何 圆
- 59 互联网能帮助反腐败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鲁建坤 吴湘华
- 79 量化宽松背景下美国宏观经济对国际油价的影响
——基于实体与虚拟两个层面 董加加 鲍 勤
- 101 转型期前后居民储蓄率的长期均衡、短期波动及结构性变化
——基于 1953—2012 年数据的协整分析 陈 慧

综述

- 122 布坎南论阿罗不可能定理和民主的本质：兼及对民主转型问题的启示
汪毅霖 罗 影

学习与思考

- 141 “思想市场”与“意见市场” 曹 钦

名家工作论文编译

- 150 资本主义一般规律之兴衰
——评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 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
贾拥民 编译

Contents

Feature

- 2 Development of a Large Country: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Geography *Lu Ming, Zhong Huiyong*

Papers

- 21 Religious Person and His Implication in Institutions *Sheng Hong*
35 Will the Relaxation of One-child Policy be Good News for Old-age
Support in China?: Fertility Dec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ld-age Support *He Yuan*
60 Does the Internet Reduce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Lu Jiankun, Wu Xianghua
80 The Impacts of U.S Macro-Economy on World Oil Price during
Quantitative Easing: Analysis from Real and Virtual Economy
Aspects *Dong Jiajia, Bao Qin*
102 Household Saving Rate around the Transition Period: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Short-term Fluctu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s
Cointegrated Evidence from China (1953 – 2012) *Chen Hui*

Summarisation

- 123 Buchanan's Thought about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and Nature of
Democracy: An Enlightenment on Democratization *Wang Yilin, Luo Ying*

Learning and Thinking

- 142 Ronald Coase and the Two Meanings of "Market of Ideas" *Cao Qin*

Papers by Masters

- 151 The Rise and Fall of General Laws of Capitalism
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Summerized and tr. Jia Yongmin

特稿

大国发展：地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陆 铭 钟辉勇*

摘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其地理和政治（特别是地方政府间关系）是分析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视角。中国的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制度安排虽然有效地激励了地方官员追求本地经济增长，但这种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地方主义却与经济集聚发展的规律相矛盾，既导致了经济效率的损失，也难以持续地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再加上当前劳动力尚未充分流动导致地区差距巨大，同时又是一个有着统一货币的大国，使得中国经济面临在欧元区国家间已经出现的统一货币与地区间差异巨大的矛盾。对于未来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关键在于统一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充分享受大国应有的国内市场规模经济效应。

关键词：大国发展；经济集聚；地方主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电子邮件：lumingfd@gmail.com。钟辉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件：zhonghuiyong@gmail.com。作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3&ZD015、12AZD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3JJD790004）的资助。本文也是“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的成果。

Development of a Large Country: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Geography

Lu Ming, Zhong Huiyong

(Fudan University and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s geography and politics (especially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re indispensable lens in analyzing its economy.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marriage of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efficiently motivates local officials to pursue local economic growth, it raises a paradox between localism and agglomeration, causes an efficiency loss and also makes it hard to sustain a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What's worse, a unitary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wide regional gap produced from insufficient labor mobility give rise to the same phenomenon in the Eurozone.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therefore, rests on an integrated market that facilitates the free mobility of production factors (labor force in particular), and in turn gains the scale economy of the domestic market owned by the large countries.

Key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Agglomeration, Localism; Free Mobility of Production Factors

JEL Classification: H70; J61; O20; R10

一、引言

对中国这样一个 13 亿人口、国土面积接近 1 000 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而言,如果不引入空间(地理)因素,那就无法分析国家内部巨大的地理差异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如今中国内部,生产要素的跨地区再配置遇到了巨大的制度障碍,并由此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效率损失,这与大国内部的央地关系和地方间关系(政治)有关。

然而,到目前为止,除了区域经济学这个学科之外,通常经济学对一个国家的研究大多是将其作为一个没有内部差异的点来对待,这样,国家层面的研究和国家内部的空间分析是脱节的。而对于区域经济学研究来说,也大多假定在一个国家内部没有制度层面的生产要素流动障碍,从而忽视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

鉴于以上现实问题与研究进展的差距,我们认为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必须将地理和政治的经济学分析结合在一起。这种分析范式有两个基点:一是在经济地理学(economic geography)中的规模收益递增假设,二是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分析下所揭示的市场分割和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在过去十年的研究中,这种“地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构成了我们研究团队一系列研究的路径。这篇文章将围绕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行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其中也会评论到一些其他作者的相关研究,但对于所引用文献的取舍肯定是挂一漏万的。

本篇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由于地理本身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空间又是与一个国家的规模密切相关的,因而对地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不可避免要在给定国家规模的基础上进行。基于此,本文第二节主要从理论上总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承担的治理收益

与成本。该节的核心观点是,国家规模大小本身也会影响这个国家国民的成本和收益,而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大小又与该国历史上逐步形成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有关;第三、第四节将分析目前中国面临的两个重要矛盾:第三节讨论经济集聚与地方主义的矛盾,这是地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问题;第四节讨论一个目前相对来说研究较少的矛盾,即劳动力尚未充分流动与货币已经统一之间的矛盾;本文最后一节根据上述两个重要矛盾分析得出相关政策含义,并将总结相关研究对于中国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含义,同时也将指出相关研究的经济学一般价值。

二、 大国治理的制度与绩效

不可否认,国家大有很多好处,对此,本文作者之一曾在《空间的力量》一书中有过详细的总结(陆铭,2013)。具体来说,在一个前现代经济,国家大有利于皇帝收税,有利于全国各地相互分担风险,有利于防止境内发生战乱。在现代经济,国家大有利于公共品提供,包括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等。同时,大国内部各地分担风险的机制仍然存在。最新的研究发现,大国的经济波动更小(di Giovanni & Levchenko, 2012)。在中国,当一个省面临经济冲击(比如自然灾害)时,省之间的财政转移可以减少受冲击省的消费波动,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也有助于减少内地省份的消费波动(Du, He & Rui, 2011)。

同样,小国也会有很多好处。比如,对于小国来讲,民众之间的同质性更强,这会减少由于偏好、宗教信仰等的差异所带来的矛盾,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政策制定上,由于国家小,民众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信息传递会更直接,民众也更容易去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并使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更容易符合大众的公共利益。这种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会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最终提高一个国家的治理效率(Lassen & Serritzlew, 2011)。

在农业社会,人口是分散分布的,国家层面的规模经济还不太需要国家内部的经济集聚,此时大国的优势还相对不那么明显。而现代经济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这时,规模的重要性不仅没有比前现代时期下降,反而是更加重要了。特别是当经济高度开放的时候,经济集聚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现代经

济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总结为三方面：第一，通过产业政策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借助于规模经济效应来降低平均生产成本。第二，规模经济也有利于分摊固定投入，推进技术创新。第三，规模经济有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与本土文化、本国需求高度相关的产业(陆铭,2013)。在一个大国内部，其规模经济优势还需要借助于一国内部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来得以实现，在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少数都市圈，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得以获得较强的知识外溢性，有利于生产率的提升。

在现代经济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能够被少数大国(或经济体)所享有，这个好处就是能够获得作为国际媒介货币(international vehicle currency, IVC)的铸币税。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使用外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交易成本与这种货币的全球使用程度成反比。一国的货币要成为 IVC，其经济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其他经济体保持优势。世界上目前主要的 IVC 就是美元和欧元，曾经作为 IVC 的英镑因为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逐渐被取代，而日本与美国 GDP 之比在 1991 年的最高峰时只有 60%，因此，日元从未真正成为 IVC(胡永泰,2013)。

尽管作为一个大国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这也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规模越大越好。随着一个国家国土面积的增加，该国人口规模和自然资源等也会增加，然而这种人口规模和民族多样性的增加却会使该国治理成本增加。有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商业往来的交易成本甚至堪比不同国家间贸易的交易成本(Aker et al., 2014)。因此，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增加所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平衡(Alesina & Spolaore, 1997; Desmet et al., 2011)。事实上，即便在“二战”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全球许多国家的规模也因为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对比而发生了变化，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冷战”结束之后苏联的解体。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大国治理的成本本质上是个信息问题。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那么大国治理就变得简单了，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就可以很好地治理一个国家。而现实世界是，信息永远是不完全的，在这样的现实世界里，大国治理将面临三个方面的成本。第一，政府科层制下的代理成本，换句话说，地方政府没有激励追求全社会的公共利益，甚至中央政府的具体官员也并不必然追求全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二，一个地方的行为可能对另一个地方带来正的或负的外部性：正外部性如教育，A 地的教育投资却可能给 B 地带来收益；负外部性如排污，上游的排污成本却由下游承担。这时，中央对于地方的协调

和监管则遭遇信息问题,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将遭受损失。第三,公共品供给的困难。对大国而言,由于国家内部地理和民族之间的异质性大带来的公共品需求的异质性也会增加,这使得公共品供给的难度增加。对当下中国而言,如果再考虑到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下公共品供给的激励不足,使公共品的供给严重落后于需求。

大国治理的难题可以在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加以解决。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大帝国往往最终走向解体,通常都是因为没能解决好技术和制度的问题,使得大国的统一难以维持。相比之下,中国自秦始皇开始就在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为国家长期维持一个统一的大国打下了基础。其中,从技术的层面来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文字和度量衡,修建了由都城到全国各地的驰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管,也降低了国内各地间的交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对于大国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制度被概括为政治集权加经济分权(王永钦等,2007;陆铭等,2008;Xu, 2011; Lu, et al., 2013),这种制度的基本框架实际上早在秦始皇时期所开始的“郡县制”就奠定了,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中国的体制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提高国家治理效率方面确实达到了重大的成效。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有着有效的人事控制权,通过“行政分包制”将具体的目标下达给下级政府,并且加以实际的考核指标,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与中央的政策目标保持一致。中国将中央目标进行行政上的“纵向分包”,再引入地区之间的“横向竞争”,这样的体制最为成功的经验就是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周黎安,2008;2013)。而当中央政府发现地区之间经济规模差距有所扩大时,中央政府会试图通过偏向内陆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来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陆铭、向宽虎,2014)。当发达地区政府发现中央希望缩小地区间的差距时,对此的策略是主动调低本地的经济增长目标,特别是那些省委书记是中央委员的省份会更大幅度地压低经济增长目标(徐现祥、梁剑雄,2014)。虽然中央对于地方的监管是有成本的,但中央可以将具备某些特征的官员提拔到领导的岗位上,以使得地方官员能够更好地追求中央的目标。例如,越来越多的文科背景的官员被提拔为省委书记,这样的书记会增加所在省的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以使得地方政府偏向经济发展的政策可以得到一定的纠正(Lu, Xia & Xiao, 2014)。

尽管当前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经济维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制度并非完美,并且其负面影响越来越凸显。中国目前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它难以有效地解决

长期激励问题,从而使得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王永钦等,2007;陆铭等,2008;周黎安,2008;Lu et al., 2013)。^①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为了加强对于地方官员的控制,还实施了两条重要的制度,一是任期制,二是异地交流制。尽管任期制和异地交流制总体上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张军、高远,2007),并且异地交流也有助于降低官员流入地的腐败程度(陈刚、李树,2012),但这也使得地方官员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仅考虑在自己任期之内的经济绩效,使得经济处于一个动态无效率的状态。比如,地方官员需要面对多重发展目标,在任期制之下,短期目标(如当期经济增长)被鼓励,而长期的发展则容易被目前的官员忽视。具体地说,在财政支出的结构安排上,地方政府有激励将财政支出花在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的方面,却不愿意在有利于长期增长的科教文卫等方面多花钱(傅勇、张晏,2007)。并且,相对于本地官员,异地交流的官员会将更少的钱用于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支出,而将更多的钱花在有助于短期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上面(Persson & Zhuravskaya, 2012)。

当然,经济政策的短期化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因为一般社会民众普遍存在短视的问题。在其他国家,选民也会将选票投给能在短期内满足民众目标的政客。但是,在中国,经济政策的短期化却被政府官员行为的短期化加强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短期化的倾向使得官员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地方主义甚嚣尘上,从而当地区的局部利益与全国的全局利益冲突的时候,全局利益就难以实现。例如,以邻为壑式的市场分割政策有利于本地的增长,但却可能因为损失了效率而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增长(陆铭、陈钊,2009)。地方主义与经济集聚之间的矛盾正是当前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所遇到的巨大障碍之一,下面我们将详细论述。

三、经济集聚与地方主义的矛盾

来自国家层面的规模经济不仅与国家的规模有关,而且也与一国内部经济活动的空

① 在“分权”体制下,为了激励地方发展经济,中国用GDP增长和招商引资来考核地方官员,一个地方如果经济增长更快的话,这个地方官员就更可能晋升(Li & Zhou, 2005)。虽然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Shih, Adolph & Liu, 2012;陶然等,2010),辖区的经济规模才是影响地方领导人晋升的直接因素(杨其静、郑楠,2013),地方政府官员在基于增长绩效的考核体制之下努力工作,并不一定体现在绩效更好的官员得到了晋升。

间分布有关。仔细来看世界上各个国家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通常是高度集聚在以少数几个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里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越是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和人口的集聚程度越高(World Bank, 2009)。

在一个国家内部,经济集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方面,上下游以及相关产业的集聚发展可以减少企业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交流成本,后者对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且,随着企业的集聚,消费型服务业也会随之而集聚,这是因为消费型服务业本身是为人服务的,并且此类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发生,在空间上不可分离。另一方面,越是在技术、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的产业,越是需要集聚在一起相互分享、生产和传播知识。而一个国家此类产业的比重越高,经济的集聚程度也越高。^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备发挥大国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可能,但这种优势的实现,还需要经济的空间集聚发展和国内的市场整合这两大必要条件。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一些国际大都市基本上都曾经是海港或河港,这与历史上这些地区水运发达,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有关。今天,虽然很多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已经不再是航运中心,但因为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性,经济和人口仍然在这些历史上的港口城市集聚。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沿海口岸的对外开放,中国的产业早已经是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然而,从1953年到1978年间,中国的产业发展并没有遵循经济规律,而是出于当时军事战备和平衡发展的考虑,把大量的国有企业往内陆迁移,进行三线建设。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中国经济开始重新出现非常明显的往东部沿海港口和内地一些沿江城市(特别是长江沿线的港口城市)集聚的趋势(Wen, 2004; 金煜、陈钊、陆铭, 2006; Lu & Tao, 2009; 陆铭等, 2011)。从这一历史规律来看,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中国沿海地区、内地一些大城市和沿江城市成为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中心的格局在未来不会发生大的变动。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相比,中国有两大显著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中国仅东部单面临海,大陆海岸线长度达1.8万公里;另一个重要的地理特征是,中国全境中大量国土面积为不宜居的地区,著名的胡焕庸线(又或称做“爱辉—腾

^① 关于经济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已有非常多的理论和经验文献,这里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见陆铭等(2011)。

冲一线”)将中国划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大部分。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 2000 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 43.18% 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 93.77% 的人口和 95.70% 的 GDP。^① 自胡焕庸线提出约 70 年来,这条线两边的人口比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② 这样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使得中国经济和人口未来向沿海地区、内地一些大城市和沿江城市的集聚成为必然趋势。大量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当前的大城市还远远没有达到最优规模,中国向大城市的集聚仍然不足,而非已经过度集聚(Au & Henderson, 2006; 陆铭, 2013)。并且,中国当前城市规模继续扩大还有非常多的好处,比如,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劳动者就业概率的提高,提高其收入,而这种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低技能者而言受益最大(陆铭、高虹、佐藤宏, 2012);除此之外,核心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经济的集聚程度,有利于利用排污和治污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单位 GDP 的污染排放量,有助于改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陆铭、冯浩, 2014)。

然而,当前不容乐观的是,中国现有体制所产生的地方主义却成为阻碍劳动、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的力量,并进而阻碍大国规模经济和经济集聚规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地方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而在当代中国,地方主义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各个地方的政府都想做本地的经济规模。这个动机的来源是多方面的。首先,地方主义本身是有规模经济机制在其中起作用的,因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都有当地范围内的规模经济机制。当地方政府需要为本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筹资和支出时,就会有最大化本地经济规模和税收的动机。第二,如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中包括了经济增长率的指标,那么,下级政府也会有最大化经济规模的激励。这两个动机只要有一个成立,地方政府的一个“占优策略”就是,不管其他地方怎么做,本地政府将采取分割市场的做法,尽可能限制劳动、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从而实现本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陆铭、陈钊, 2009)。人口流入地也有激励控制人口流入,从而避免外来人口分享本地的公共服务(陈钊、陆铭, 2008; 刘晓峰、陈钊、陆铭, 2010; Chen, Liu, & Lu, 2013)。而在一些新兴产业,地方政府也有动机尽早进入这些行业,

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胡焕庸线两边,每一边人口份额和 GDP 份额相差不多,这意味着,在人均 GDP 的意义上,胡焕庸线两边是平衡的,而胡焕庸线西边的人口份额和 GDP 份额非常小。换句话说,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区域平衡发展时,重点是胡焕庸线东边的地区间问题,并未涉及西部边陲和相应的国防问题。

② 参见 360 百科, <http://baike.so.com/doc/6028355.html>。

并利用激励机制鼓励其发展,以便未来获得国内地区间贸易的更大收益,而这种地方主义的策略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各地之前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陆铭、陈钊、严冀,2004)。^①大量的经验研究也表明,从全国层面来讲,地方主义严重阻碍了地区产业的集聚,并进而抑制了规模经济的作用(Bai et al., 2004; Poncet, 2005; Lu & Tao, 2009)。

地方主义所导致的市场分割阻碍了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并不利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地区间发展战略考虑,采取偏向内陆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来促进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希望借此缩小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但如果在不开放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只通过中央政府集中财力来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实现地区间平衡,由于这种区域平衡政策与经济集聚的规律相违背,最终将不仅损害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也使得地区倾向的平衡发展政策难以持续(陆铭、陈钊,2008;陆铭,2010;陆铭、向宽虎,2014)。

四、劳动力尚未自由流动与货币统一的矛盾

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解释一个国家经济变迁的时候,通常假定该国存在一个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组成的加总生产函数,国家内部的生产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生产要素因此也可以在国内自由流动并实现最优的配置。然而,这种理想假设往往只是为了理论的方便,当考虑到一个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异质性和其他阻碍地区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时,生产要素的误配就不可避免(Banerjee & Duflo, 2005)。

中国当前面临生产要素跨地区再配置受到制度制约的状况。由于地方主义所产生的各种保护本地市场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市场分割,使得劳动力、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自由配置面临严重障碍(Brandt, Tombe & Zhu, 2013)。具体来讲,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没有本地户籍的劳动者在就业、社会保障和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等方面相对于本地户籍人口都面临着歧视,这不仅导致了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不自由和充分,也进一

^① 对于这种由地方主义导致的市场分割,如果中央政府发挥协调作用,可以通过转移支付让地方政府放弃导致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的行为。范子英、张军(2010)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